

基于文化社会学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研究

郭占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 梁漱溟从文化层面对我国乡村建设进行反思, 认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侵和冲击导致了乡村凋敝, 进而提出乡村建设理论。建设中国, 应从乡村入手, 要建设乡村, 应从文化重建入手, 具体要重建社会组织构造; 强调科技兴农, 以农业引发工业; 在知识分析辅助下, 发挥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关键词: 梁漱溟; 乡村建设思想; 文化社会学; 文化重建; 科技兴农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4)04-0182-04

20世纪20-30年代, 梁漱溟提出了乡村建设思想, 其所倡导的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是“现代新儒学政治观”, 在理论设计和具体实践中, 不是着眼于救济、改良, 而是为建设一个新国家奠定基础。乡村建设实是建国运动,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建设而推进政治民主化, 以至奠立完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于后。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1]。许多学者曾批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念以及“文化失调论”, 认为梁漱溟的文化建设是简单的复古主义, 是落后的, 是保守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代表, 是完全排斥西方的思想。在以往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研究中, 一般将其定位为一种保守主义或改良主义的思想, 以区别于当时的西化派(以胡适为代表)与革命派(以毛泽东为代表)思想。这种判断现在看来无疑是过于简单了^[2]。

一、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文化失调论”

(一)“文化”的宽泛解释。梁漱溟提出“文化失调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因为其受德国文化社会学的“文化哲学”或者“历史哲学”学派影响较大。德国“社会形式论”代表人物齐美尔、文化社会

学家马克斯·舍勒以及艾弗勒·韦伯都承认文化是复合体, 其范围十分广泛^[3]。梁漱溟的“文化”涵义正是该学派所定义的含义。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也认为: “文化, 或文明, 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 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4]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 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个方面, 器物 and 风俗, 由此可进而再分成较细的部分或单位。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 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5]在人类学家乌格朋看来, “文化”等于“社会”。其实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中, 物质的应用, 确是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有物质文化一词之设, 用以显示物质方面文化的重要。文化一词, 像社会遗产(Social Heritage)一样, 包括一切物质文化及其他如知识、信仰、道德、法律及习俗等文化部分^[6]。

受上述理论的启发,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 “文化, 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 必依靠于农工生产。农工如何生

收稿日期: 2013-12-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3XSH031);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G07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技创新专项(2011171); 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背景下的农业科技推广机制研究项目(TGZX2012-34)

作者简介: 郭占锋(1977-), 男, 陕西咸阳人, 博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

产,凡其所有器具技术及其相关之社会制度等等,便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7]。同时,梁漱溟认为农村是根本,乡村文明是根本,提倡“礼俗”并非简单的复古,也并非保守,而是在中西文化对比基础上的“调和”思想,他主张吸收西方的物质文化为我所用。但是,在文化方面他是不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的,他认为中国在文化方面胜过西方,是个早熟的文化。这种路径恰恰是文化社会学的学科路径,即在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进行调适。文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含许多内容,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来重建社会秩序。因此,梁漱溟首先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组织结构”,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与西方所谓的“阶级社会,职业社会”构造不同^[8]。“乡村建设是重要的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9]，“社会无秩序,则社会生活不能进行”,“教化,礼俗,自力是维持的几个要点”而“礼之一物,非宗教,非政治,亦宗教,亦政治为中国所特有,居其文化之最重要部分”^[10]。在梁漱溟看来,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建设乡村就是建设乡村文化,建设文化就是重新构造建设中国社会组织。因此,他把中国农村的问题概括为“文化失调”,此处的“文化”其实就是指“社会”。

(二)文化传播学派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呈现三条路向:第一条路向,为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发展为其根本精神;第二条路向,即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合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第三条路向,为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11]。此后,他提出“中国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认识到社会组织结构对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深入剖析了中国与西方社会组织构造,认为西方社会是“个体本位,阶级对立”,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12]。但是,西方的“个人本位”与“阶级对立”社会思想进入中国后,摧毁了中国“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出现了所谓的“文化失调”,由此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文化失调突出表现于西洋“都市文明”对中国传统“乡村文明”的破坏。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原为乡村国家,以乡村为根基与主体,而后发育成高度的乡村文明。近代以来中国这种乡村文明受到来自西洋都市文明的挑战。西洋文明逼迫中国往资本主义工商业路上走,而80多年来除了乡村遭到破坏并未

见都市的兴起,只见固有农业衰残而未见新工商业的发达。这是梁漱溟等所最感到痛苦的事。梁漱溟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通过文化的改造和完善来解决农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并提出了一套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其强调“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13]。梁漱溟认为重新构造社会组织异常重要,同时也必须坚持两个原则,即“一是从理性求组织;一是从乡村入手”。“从理性求组织”就是既要“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心向上为目的”,又要充分容纳“西洋人的长处”。“从乡村入手”就是要“藉以继续发挥”中国乡村固有的“伦理的社会、情理的社会”的风气^[14]。基于此,梁漱溟进而提出,新社会组织构造应当是补充和改造中国古人乡约而建立起来的“村学乡学”,这是一个集政、教、养、卫为一体的村社组织或乡村组织。就经济而言,梁漱溟认为“单从经济上做功夫,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必须注意经济以外而与经济相关系那四周一切的事情,而做功夫才行。这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农民自身;因事情要靠人做,所以人的问题当先”,“人的问题当先”,自然地就要落到文化与教育的点上来^[15]。

二、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下的乡村建设方案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并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而是一种整体发展思维观。

(一)重建社会组织构造。“我们讲新的建设,就是建设新礼俗。那么,所谓新礼俗是什么?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完全沟通调和成一事实,事实出现我们叫他新礼俗)”,“在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崩溃之后,所要有的未来的中国新社会,将不期然而然的是一个中西具体的融合”^[16]。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目的,确实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而是基于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融合。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主要是接纳其先进的物质文化;而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精神生活则是高出西方的,应保持不变。即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接受西方文化,并将其融汇于中国文化之中。鉴于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组织结构在城市已被摧残殆尽,梁漱溟认为,构建新的社会组织必须从

乡村入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西方所走过的工业化与都市化道路,于梁漱溟看来,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应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这条路即是从农村引发工业,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他还具体谈到实现以上构想所依靠的力量,在于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的合作。由于缺乏团体力量,中国社会多年来一直处于散漫无序的状态,而乡村则更为严重。因此,重整乡村组织的关键,就在于从教育农民、培养农民的智慧入手,“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17]。“乡约这个东西,它充满了中国人精神——人心向上之意,所以开头就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它着眼的是人生向上”^[18]。

(二) 强调科技兴农,以农业引发工业。梁漱溟认为,只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才是消灭阶级、进入理想社会的必由之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用于农业是至关重要的。仅靠单纯的技术指导是不能从根本上促进农业发展的,因为零散的农民从事小块田地的作业,断无法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销售运输合作社等一系列健全的合作系统,才能有效地改变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面貌^[19]。他强调,乡村建设决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业,而必须与中国的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等相协调而发展。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发展农业,建设乡村,繁荣乡村,固然是最起码的目标,然而却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中国兴亡系于中国能否工业化”^[20],只有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中国才能最终走向繁荣富强^[21]。这种思想与现在国家以农业为本的发展思想是吻合的。

(三) 在知识分析辅助下,发挥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所谓“组织”就是大家合起来的意思。乡村的事必须有组织才有办法;也就是说乡下人能齐心协力地合起来才好办^[22]。“农民自觉了,乡下人明白乡村的事要自己去干了;但是怎样干法呢,这还要靠乡村组织”^[23]。“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学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24]。基于上述分析,梁漱溟认为,无论是新的社会组织——村学和乡学的重建,还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主张的实施,一定要以乡村人为主力,如果乡村人自己不动手,那么,乡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仅有乡村人还不行,还必须要有代表“理性”的知识分子与其结合,“必须

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办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25]。梁漱溟甚至认为,要解决中国问题,“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26]。只有“此二种动力构成一个力量,上下互通声气,头脑与身体合而为一,则中国问题之解决,亦颇容易”^[27]。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至少可以起到两种作用:一是为乡村扩增“耳目”。乡村最大的病症是愚蔽,绝大多数农民一字不识。知识分子下乡则可以给乡村带去新的知识和新的信息,开阔农民眼界。二是为乡村增添“喉舌”。乡村最大的缺憾是遭遇祸害没人理会,农民由于不识字,无法引起社会的注意。而知识分子则较为敏感,容易发现问题,他们能说会道,富于感召力,可唤起社会关注乡村问题^[28]。

当然,从高层次的要求来说,知识分子下乡仅起上述两种作用是不够的,还必须起更进一步的作用,即为乡村添一“头脑”,谋划诸如兴修水利、养猪放鱼、开垦荒山、植树造林、改良土壤、引进先进技术等建设事宜,使自己成为乡村建设的运动者。梁漱溟断言,如果知识分子下乡,真能起到乡村的“耳目”、“喉舌”尤其是“头脑”的作用,那么,中华民族的前途就会大有希望,整个中国问题也就有解决之一日^[29]。

三、启示与讨论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在理论陈述与付诸实践的行动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学洞见与文化自觉,正是当今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需要的智慧和心态。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实意义之所在^[30]。梁漱溟所提倡的乡村建设不仅仅是乡村经济建设,也是一种具有广泛涵义的文化建设,是西方文化冲击下对于中国文化所选择的道路,这是梁漱溟与其他乡村建设倡导者之间的最大不同。

孙本文曾说,社会建设计划,必须以文化环境为背景;或旧文化发见流弊,而必须予以补救;或旧文化不能应时势之要求,而须有新文化以补充其缺陷,必皆以旧文化为基础^[31]。因此,重建农村文化就显得很重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虽然在当时特殊的环境背景下没有取得成功,但在政治社会经济条件适宜的情况下,越发显示其魅力和生命力。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是农业社会。农民理性与农业社

会是相匹配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主要适应于生存的需要,或者说是生存理性^[32]。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单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33]。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风险,个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个人)越来越难以负担起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此时,市场调控是必要的,但市场必须“嵌入”在社会之中,国家必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不能允许也不可能出现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3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发展总体上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农村文化发展滞后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二是农村公共文化滞后于农村私性文化的发展^[35]。当前,我国部分乡村正面临着“共同体解体”带来的种种困境:第一,乡村公共品的供给由于集体经济瓦解、公共资源匮乏和大量不可遏制的“搭便车”行为而变得严重不足。第二,乡村社会关系也危机四伏。乡民的集体认同感和互助合作的基础减弱,乡民之间传统的关系正在为利益所侵蚀。即使还有互助,也难以形成合作,在面对风险和危机时往往难以形成“集体行动”^[36]。既然整个文化已经变成了社会的和国家的文明,那么在这种与之相似的形态下,文化本身也在走向没落,除非它的分散的胚胎仍然具有生命力,除非共同体本质和思想重新得到滋养,并且在行将灭亡的文化之内悄悄地发展着新的文化。随着现代性“下乡”,农民的工具理性或经济理性不断上扬,“它不仅改写家庭的结构与意义,重塑社会的联结模式,还会导致他们的生活意义弱化,现时化与自利化,并对村庄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使当下农村社区陷入“结构混乱”之中^[37]。

当今,在农民文化精神越来越贫乏,文化公共空间几乎消失之时,梁漱溟的“乡村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对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应重视农村文化建设,核心是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建设新农村,应该立足农村,真正从农村现实出发。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是以乡村为发源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也一直保留在农村。要建设农村,必须借助农村文化的重构,而要改造旧文化,使失调的文化能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就必须依靠乡农教育。

参考文献:

- [1][8][9][10][1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5;31;25;41;133.
- [2][30]熊春文.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的社会学解读.社会[J].2007,(3):26-43.
- [3]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52.
- [4]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 [5][6]费孝通文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2:207;3.
- [7][1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57.
- [12][13][14][17][20][27][28][29]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168;611;308-317;479;579;785;227;227.
- [15][18][19][21][25][26]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318;321-322;527;417;315;467.
- [22][23][2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25;618;618.
- [31]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97.
- [32]沈红,等.边缘地带的小农——中国贫困化的微观理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5.
- [3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72-73.
- [34]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9-148.
- [35]吴理财.乡村文化的“丛林原则”[J].人民论坛,2011,(3):68-69.
- [36]黄平,王晓毅.公共性的重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06.
- [37]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87-94.

责任编辑:梁玉珠